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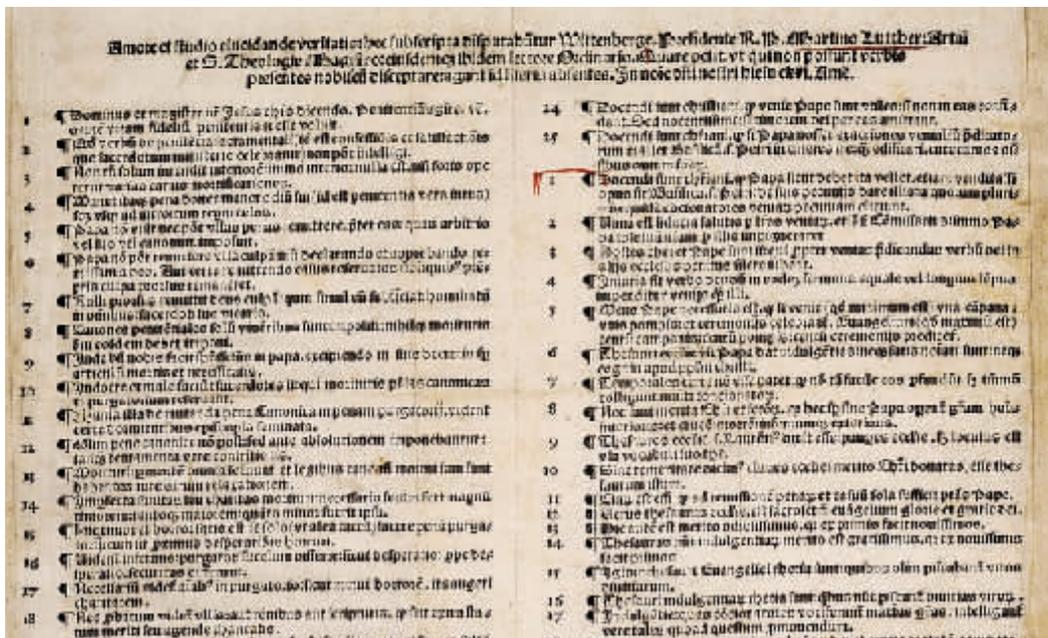
专题

← (上接5版)

大教堂。教会的高层代表同时也是世俗的贵族，他们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资助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如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其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这些论纲本身是用一种学术性的神学专业语言撰写的，论纲爆炸性的威力因此只向专家们进行了展示。不久之后，路德发表了更容易理解的《关于赎罪和恩典的布道》(Sermon über Ablass und Gnade)。他一开始并未对教会的资金筹措实践和教会代表人物的奢靡生活方式提出太多批评，而是更多地以神学论据批评了通过赎罪券交易完成忏悔和得到救赎的理念。另外，天主教会内部也觉悟到了问题，并在1562年禁止了赎罪券交易，这同样也是宗教改革以及后来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后果。但在1517年的时候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鉴于他的批评，天主教会以异端邪说罪对路德提出了起诉，并决定于1518年在罗马对他进行审判。在遥远的意大利，路德活着离开法庭的机会明显更加渺茫。因此，在这个时候，他的领主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Weise, 1463—1525)为他出面，争取到将审判改为在奥格斯堡进行。路德在奥格斯堡明确反驳了教宗的无误性，从而使自己在实际上犯下了异端罪。但是选帝侯弗里德里希拒绝交出路德，在他的协助下，路德得以在接受判决和逮捕之前踏上逃亡之路。第二年，即1519年，不但约翰·特策尔去世了，就连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也驾崩了。这期间，政权接替成为棘手的问题(教宗自当积极介入其中)，人们不得不暂停对路德的诉讼程序。诉讼直到1521年才在沃尔姆斯(Worms)重新开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诉讼暂停期间，路德于1520年撰写了三篇十分重要的宗教改革的纲领性文章。第一篇文章《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是政治性的，企图争取让德国贵族支持宗教改革一事。第二篇文章《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Von der babylonischen Gefangenschaft der Kirche)致力于探讨教条和制度的问题。第三篇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V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istenmenschen)。



1517年纽伦堡印刷的路德《九十五条论纲》(局部)，现藏柏林国立图书馆

### 个体性和内心世界的 发展

路德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提出了貌似矛盾的论点：基督徒是自由的，不屈从于任何人；基督徒同时又是奴仆，屈从于任何人。为了说明自由和奴役的并存状态，路德将属灵、里面之人和属肉体、外体之人区分开来。人不只是一个灵魂。他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是里面的，而是以外体、属肉体存活于世。出于这一原因，路德在第二步论述中探讨了属肉体的、现实之人的自由和不自由。我们作为外在的肢体被纳入社会关系中，必须在我们与其他人的相处中遵守律法和诫命。为了自己的永恒幸福是无须对其他人做出善行的，善行只是在世俗和社会的环境中满足其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实现我们灵魂的得救而必须这样做，我们是自由的，怀着爱心去服事邻人、家长、诸侯和主教。由于信徒一方面是自愿和出于爱而有服事的意愿，而在另一方面，尘世的关系本来就是次要的，所以好的信徒会自己适应相应的政治条件，避免骚动和愤怒。根据路德的说法，一个基督徒是乐意屈从于世俗权力的。即使是教宗、诸侯和主教，乃至暴君，他都是自愿服事，只要君主的要求不悖逆上帝的诫命，“正如基督为了我而自愿所做和所忍受更多”。

对于路德而言，重要的首先是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的救赎。他大概也是后来才逐渐明白在自己的批判中包含政治方面的内容。同时，在一个宗教和政治如此密切相连的社会中，信仰的问题是法不应对具体政治统治问题造成影响的。路德的思索一

开始主要是神学的，但这些思索和成功发表的文章，越来越深地把他拉入了当时政治变革的漩涡之中。通过所有基督徒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全部平等的思路，路德产生了诸如普遍祭司职分的理念。神甫、主教和教宗是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祭司职分不必是获授圣职和尊为圣人的精英人士，而只是一种职能性分工的结果。“灵魂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论点以及对于信心和内心确信的专注，促使个体性和内心世界的发展——个体性和内心世界正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概念的基本所在。后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教派和现代市民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联系，并非无凭无据。此外，路德树立了圣经的权威性，即便对于圣经究竟应如何解读仍然存有争议，但是他以此提供了一份正面说明人类制度专制统治的文件，从而让人的统治从属于一个基础文本，这个文本几乎发挥着宪法一般的作用。路德虽然实际上并未质疑传统统治制度的效用，但是这个制度对于路德不再是神圣的、上帝所希望的，而是一个充其量只能说是实用的、凡人的组织。

### 上层贵族与市民阶 层的胜利

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等级制度由教会代表、贵族以及自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给人的印象虽然总体稳定不变，但实际上，这三个等级内部和之间会不断产生冲突。教宗和皇帝争夺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统治权。众位王侯们与皇帝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同时高级和低级的贵族之间也有竞争。主教们几乎都出自贵族家庭，其政治活动往往也与世俗的贵族们一般无

二。城市里的市民阶层为了独立性而战，农民们则想要摆脱专制和剥削。不同的行为主体都试图在等级制度内部对这个组织架构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变，于是不断产生争议，甚至是战争。由于前文所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这些冲突在15世纪后期日趋激化。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以及围绕教会赎罪券交易的正确性所展开的讨论，加强了人们提出质疑的决心。德国的一部分上层贵族——比如“智者”弗里德里希——特别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即便付出了具有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的代价，但也由此决定性地加强了上层贵族在德意志帝国中相对于教宗和皇帝的崇高地位。部分下层贵族和骑士面对城市新兴市民阶层和众位王侯越来越集中的统治，几乎无法再维持自身的地位，于是开始在农民身上寻找补偿。许多下层贵族也为了宗教改革(和自己的利益)与上层贵族斗争，但却失败了。中世纪晚期骑士和城堡的时代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最终划上了句号。

农民也引用路德的观点，要求改善自身越来越艰难的境地。1525年，他们在梅明根集会上草拟了一份檄文《十二条款》，并通过新式印刷机迅速将其传播至整个帝国。农民提出的要求包括允许他们选举和罢免自己教区的教士。狩猎以及在森林里伐木的权利不应只属于贵族，或者至少应该像以前那样，提供一些大家都可以自由利用的集体土地面积。在第三条中，农民们要求废除农奴制度。“迄今的习俗将我们当成家奴(农奴)，这是十分令人同情的，因为基督以宝贵的流血牺牲救赎并换取了我们所有人，无论是牧羊人还是最高贵的人，全都一样，没有例外。因此，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想要自

由，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由来。”农奴制度是世代传承的、在地主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义务。农奴受其主人管辖，未经主人的同意，既不能结婚，也不能有自己的家产。他们有义务为主人完成一定规模的劳役。根据每个主人实际做出的安排，农奴制度往往与奴隶制度没有多大的区别。15世纪后期，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自由农民因为负债而成为农奴。

路德对于降低税负、废除霸占财产和上层专制的请求一开始完全是怀着善意的，并劝告诸侯们要适度。但他坚决反对农民暴力起义或者颠覆政治制度的做法。在发生多起由武装起义农民引起的骚乱后，路德公开警告说要提防“凶残的、强盗般的农民团伙”，要求对他们实施严厉打击。农民起义在多场战斗中遭到了血腥镇压，他们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宗教改革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都被处决了。虽然中央法庭的设立开辟了通过法律途径对地主提出起诉的可能性，农民的境况在后面的几个世纪中依然如故。农奴制度一直到整整三百年后的19世纪才被废除，汉诺威王国于1833年废除了农奴制度。通过宗教改革获利的政治赢家首先是上层贵族，其后是迫切要求解放的市民阶层。平民世界和他们对待政治制度的理智、功利和许多世俗的看法毫无疑问地从宗教改革中获得了重要启发，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 路德的现代愿景

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自由都被视为一种尤为重要的文化及社会价值观。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举起了——与平等和博爱一道——自由理想的旗帜，而自由在全世界普遍得到重视，最迟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欧根·德拉克罗瓦创作于1830年的一幅题为《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的著名画作，正是对这种理想以及与之相连的、通过人们行为获得解放的思想的一种艺术表达。这类画面往往深刻影响着现代的自由观念。法国革命政府赠送的礼物“纽约自由女神像”更是成为举世闻名的象征。借助于这些象征，我们构造出自由的画面。用一句德国俗语来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不过，一幅画同时却也比千言万语所表达的内容少得多。

(下转7版) ➡